

浙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浙學

陸娟娟 著

吐魯番出土文書
語言研究

TULUFAN CHUTU WENSHU
YUYAN YANJIU

本書從文體的角度對吐魯番
出土文書的語言進行考察，
總結文書中各種應用文體的格式特點，
並編釋各種文體文書中的格式套語、
術語以及俗語詞。



浙江大學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浙江省社科聯省級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資金資助出版（編號：2014CBQ07）

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

陸娟娟 著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 / 陸娟娟著.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78-1096-4

I. ①吐… II. ①陸… III. ①出土文物—文書—書面
語—研究—吐魯番地區 IV. ①K877.94②H2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11737 號

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

陸娟娟 著

責任編輯 任曉燕
責任校對 袁金麟
封面設計 王好馳
責任印製 包建輝
出版發行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號 郵政編碼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網址:http://www.zjgsupress.com)
電話:0571-88904980,88831806(傳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圖文設計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雲廣印業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14.25
字 數 247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178-1096-4
定 價 45.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營銷部郵購電話 0571-88904970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編委會

主任：鄭新浦 蔣承勇

副主任：何一峰 邵清 周鶴鳴 謝利根

編委(以姓氏筆畫排序)

王 河	王俊豪	毛劍波	盧福營	史習民	池仁勇
楊樹蔭	吳 笛	沈 堅	陳立旭	陳華文	陳壽燦
陳剩勇	範金濤	林 正	金彭年	周 青	周建松
宣 勇	費君清	徐 斌	凌 平	黃大同	黃建鋼
潘捷軍					

編委會辦公室

主任：何一峰

副主任：俞曉光

成員：黃 獲 周 全 楊希平

總 序

源遠流長的浙江學術，蘊華含英，是今天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基因”；三十五年的浙江改革發展，鮮活典型，是浙江人民創業創新的生動實踐。無論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弘揚，還是就波瀾壯闊實踐的概括提升，都是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的“富礦”，我省社科工作者可以而且應該在這裏努力開鑿挖掘，精心洗礦提煉，創造學術精品。

繁榮發展浙江學術，當代浙江學人使命光榮、責無旁貸。我們既要深入研究、深度開掘浙江學術思想的優良傳統，肩負起繼承、弘揚、發展的偉大使命；更要面向今天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和人文社會科學建設的迫切需要，擔當起促進學術繁榮的重大責任，創造具有時代特徵和地方特色的當代浙江學術，打造當代浙江學術品牌，全力服務“兩富”現代化浙江建設。

繁榮發展浙江學術，良好工作機制殊為重要。我們要着力創新機制，樹立品牌意識，構建良好載體，鼓勵浙江學人，扶持優秀成果。“浙江省社科聯省級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資金資助項目”，就是一個堅持多年、富有成效、受學人歡迎的優質品牌和載體。2006年開始，我們對年度全額資助書稿以“當代浙江學術論叢”（“光明文庫”）系列叢書資助出版；2011年，我們將當年獲得全額重點資助和全額資助的書稿改為“當代浙江學術文庫”系列加以出版。多年來，我們已資助出版共553部著作，對於扶持學術精品，推進學術創新，闡釋浙江改革開放軌迹，提煉浙江經驗，弘揚浙江精神，創新浙江模式，探索浙江發展路徑，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和積極的促進作用。

2013年入選資助出版的27部書稿，內容豐富，選題新穎，學術功底較深，創新視野廣闊。有的集中關注現實社會問題，追蹤熱點，詳論對策破解之道；有的深究傳統歷史文化，精心梳理，力呈推陳出新之意；有的收集整理民俗習尚，尋覓探究，深追民間社會記憶之跡；有的傾注研究人類共同面對的難題，潛心思考，苦求解決和諧發展之法。尤為可喜的是，資助成果的作者大部分是我省的中青年學者，我們的資助扶持，不僅解決了他們優秀

成果的出版之困,更具有促進社科新才成長的獎掖之功。

我相信,“浙江省社科聯省級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資金資助項目”的繼續實施,特別是“當代浙江學術文庫”品牌的持續、系列化出版,必將推出更多的優秀浙江學人,涌現更豐的精品佳作,從而繁榮發展我省哲學社會科學,充分發揮“思想庫”和“智囊團”的作用,有效助推物質富裕精神富有現代化浙江的加快發展。

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 鄭新浦

2013年12月

凡 例

一、本書所引吐魯番出土文書，主要據《吐魯番出土文書》(四冊圖錄本)，文中不做特殊說明者，均引自該書。另外所據材料還有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簡稱“柳”)、榮新江等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簡稱“新”)、陳國燦、劉永增編《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簡稱“寧樂”)、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簡稱“斯”)、日本橘瑞超所獲吐魯番文書(簡稱“橘”)等。

二、引用吐魯番出土文書時，全部標明卷號及出處，每例依文書號、文書名、冊數、頁數、內容的順序引用。如 75TKM99:16《符長資父母墟墓隨葬衣物疏》(1—91):“故遮一枚。”即指引自《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第 91 頁的 75TKM99:16 號文書《符長資父母墟墓隨葬衣物疏》。文書號“75TKM99:16”指 1975 年出土於吐魯番哈拉和卓墓葬群 99 號墓中的第 16 號文書，文中所引文書編號皆如此。其中“TAM”指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群，“TBM”指吐魯番巴達木墓葬群，“TMM”指吐魯番木納爾墓葬群，“TSYIM”指吐魯番洋海一號墓等。

三、引錄吐魯番出土文書時，缺字用“□”符號表示，缺幾個字用幾個“□”，不能確定所缺字數者用“□□□”符號表示前端殘缺，“□□□□”符號表示中間殘缺，“□□□□□”符號表示後端殘缺。缺字根據上下文或文意補出時，置於“□”符號中。脫字據上下文或文意補出時外加“[]”號。假借字、訛字在原字後用“()”注出本字或正字。

四、引用其他文獻資料時，一般在引文後用“[]”符號標注文獻在“徵引文獻”中的序號及其具體頁碼(用上標)，以便核查。如《說文解字》在徵引文獻中的序號是“121”，所引例句在該書 45 頁，則在引文後用上標標注：^[121]^[頁45]對於採用意引或不方便採用上標標示出處的，則採用脚注出注，第一次出注時標明書名、出版社、年代、頁碼等情況，以後再引用時，只標明書名、頁碼。如脚注標“見孟憲寶《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濟南：齊魯

書社 2004 年版，頁 132。”再次引用時僅標“見孟憲實《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頁 254。”

五、文中除與本書說明內容相關的俗字別體，以及爲了不影響行文文義而酌情使用的簡體字外，其餘均作繁體字。

六、爲求行文簡潔，文中稱引前修時賢之說，皆直書其名，不贅先生字樣，敬請諒解。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001
第一節 吐魯番出土文書及其研究	001
第二節 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的價值	006
第二章 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特點	015
第一節 出土文書的文體特點	015
第二節 出土文書的用字特點	017
第三節 出土文書的用語特點	028
第三章 公文類文書詞語考察	049
第一節 公文文書概述	049
第二節 公文文書的類型和特點	050
第三節 公文文書用語特點	058
第四章 契約類文書詞語考察	075
第一節 契約文書概述	075
第二節 契約文書的類型和特點	077
第三節 契約文書用語特點	083
第五章 籍帳類文書詞語考察	113
第一節 籍帳文書概述	113
第二節 籍帳文書用語特點	115
第六章 隨葬衣物疏詞語考察	142
第一節 隨葬衣物疏概述	142

第二節 隨葬衣物疏的格式和特點	145
第三節 衣物疏用語特點	148
第七章 書信及其他類文書詞語考察	186
第一節 書信及其他類文書概述	186
第二節 書信等文書用語考察	187
結 語	200
徵引文獻	202
參考文獻	211
詞語索引	21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吐魯番出土文書及其研究

一、吐魯番出土文書簡介

(一)吐魯番文書的發現與出土

吐魯番出土文書指在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古代寫本書獻，主要是指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地的晉唐古墓葬群中所發現的紙質文書。吐魯番位於新疆東部，地處古代絲綢之路的要塞，自古就是中西交通的樞紐，也是西域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之一，許多東西方的古代文明都在這裏交匯傳播。正如季羨林所說過的，在全人類的歷史上，影響深遠、歷史悠久的文化只有四個，中國、印度、伊斯蘭和希臘羅馬文化體系，這四大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這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①。之所以能在這裏匯流，要歸功於貫穿全區的絲綢之路了，而吐魯番正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門戶之一。

吐魯番乾燥少雨，因而在古墓葬中的文獻大多保存完好，這也使得吐魯番文獻的發現成爲了必然。十九世紀末吐魯番地下寶庫由當地土著發現，自此吐魯番文獻也開始了如同敦煌文獻一般的盜掘劫難。所幸吐魯番文獻主要埋於地下，盜掘較難，因此吐魯番文獻雖然幾經盜掘，但其主要部分仍歸我國所有。這裏僅就我國對吐魯番文書的考察和發掘做一個簡單

^① 季羨林：《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的回顧。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對吐魯番地區的科學考古發掘有限，吐魯番文書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淹沒在敦煌文獻的光環之中。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對古代文化的保存日益重視，吐魯番文書的價值也逐漸凸顯出來。新疆地區成立了博物館、考古所，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對吐魯番地區的古墓葬群進行了十多次科學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古籍、佛經、文書、磚誌以及少數民族文字寫本。其中以1959—1975年對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及烏爾塘、交河故城等古代墓葬和遺址進行的十三次清理工作的收穫最大，清理和發掘近500座晉—唐墓葬和1處遺址，出土了近萬片文書和大量的墓磚和墓誌。所出文書的時代為晉、前涼、北涼、高昌、唐西州時期，內容廣泛，有以文書形式直接隨葬的衣物疏、地券、功德錄、告身以及一些契約等，這種文書較完整，且字迹清晰，利於研究工作的開展，但數量較少。大多數文書都是被當作廢紙，製成死者的服飾鞋襪、衣帽枕衾，殘損較大，但內容更為豐富，有書信、習字文、券契、官府文書、籍帳、古籍經典等，無所不包，從歷史、政治、文化各個層面給我們展現了一個清晰的古代社會的概貌^①。正是這批出土文書，由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合作，唐長孺主編，整理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全10冊本（1981—1992年）和圖文對照全4冊本（1992—1996年），這兩套文書成為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基本材料。

1975年至今，對吐魯番地區的考古發掘工作在不斷地進行，收穫雖不如前，但也是對前期工作的一個繼續。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分別對采坎古墓、阿拉溝古堡、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溝千佛洞進行了清理，並又對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葬群進行了發掘，獲得了近千件文書以及一些墓誌墓磚，所獲文書時代為北涼、高昌國、唐西州時期，內容有衣物疏、官牒、籍帳、券契、古籍等，對研究北涼時期的吐魯番地區的社會狀況以及高昌國的賦稅制度，唐西州時期的職官制度等問題都是極有價值的檔案資料。而像吐峪溝清理出的唐寫本《大唐西域記》殘卷，柏孜克里克出土的《漢書·西域傳》都是所見較早的寫本，其價值不言而喻^②。這批漢文文書基本上都收入了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一書中。

吐魯番地不愛寶，近十年來，又陸續出土了一批新的文獻。1997—2006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巴達木、洋海、木納爾、臺藏塔等地陸續出土了

① 《吐魯番出土文書·前言》，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版，第1—2頁。

② 《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

一批從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的文書，加上徵集到的，總數達三百多件，收錄到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一書中。

吐魯番還在源源不斷地向我們提供新的材料，推動吐魯番學不斷向前發展。

(二) 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出版

吐魯番文書甫一出土就受到了廣泛的關注，然而這些文書都是千年以前的寫本書書，是非常珍貴的文物，一般不能看到。隨著研究的深入，文書的整理工作自然就顯現出了迫切性。上述出土的這些文書，都做了相應的整理工作，其中漢文文書的整理有四種：

1. 《吐魯番出土文書》(全十冊本，文物出版社 1981—1992 年出版)

1959—1975 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近萬片文書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1981 年國家文物局、武漢大學歷史系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三個單位合作，唐長孺主編，開始對出土文書進行整理，耗時近十年，把近二千件漢文文書整理為一套十冊本《吐魯番出土文書》，由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它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吐魯番學的研究。這套文書以文書出土時的墓葬為單位，按時間順序，逐一將文書碎片上的內容轉寫出來，並對每一片文書都做了定名、定時代工作，無據可考的則依同墓出土文書做出擬定名(文書中加了問號圖示的名稱)，供讀者參考。這樣的整理工作可以想見是多麼的繁雜費力，因而這套文書中也就難免會有一些疏漏錯誤之處，如轉寫與原文字不符，或是主觀臆斷造成的文字錯誤等。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這套文書最大的一個不方便之處是沒有把原文書的圖版附在錄文之上，不利於做研究之用。而在此基礎上的第二套《吐魯番出土文書》就做出了改進。

2. 《吐魯番出土文書》(全四冊圖版本，文物出版社 1992—1996 年出版)

十冊本書書錄校本的出版讓學界有了一個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基礎，但也隨即顯出了它的不足，因而原文書整理小組在第一套文書的基礎之上，加入了圖版，並訂正了原來的一些錄文，使之更符合文書原貌，準確性更高，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這套文書是精裝本，體例與第一套文書基本相同，只是每一片文書都是上圖下文，上面是原文書照片，下面是相應的錄文。所刊照片依原件影印，較為清晰，便於讀者辨識分析。這套文書是到目前為止較為權威的版本，因為有影印的圖片，是研究者的首選資料。

3.《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柳洪亮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十冊本和四冊本《吐魯番出土文書》都是對1975年之前出土的漢文文書做出的整理,而這之後直到1990年,在吐魯番新發現的全部墓葬文書及故城、石窟等遺址出土的部分漢文世俗文書,則收入了柳洪亮的《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一書中。這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錄文,以出土地點為單位,按時代先後,公佈全部文書,並將文書照片附在書後,便於讀者查找核對;第二部分是公佈過的文書清理簡報,為研究者提供了出土文書的背景資料;第三部分則收錄了柳洪亮對這批文書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論文。

4.《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中華書局2008年出版)

1997年之後,尤其是2004—2005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巴達木、洋海、木納爾、臺藏塔等地又陸續出土了一批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的文書,加上少量徵集到的文獻,約有三百多件,集合成了這本《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八開本上下兩冊,圖文對照,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彩印圖版,文書原貌真實直觀;二是所收資料豐富多樣,同墓出土的所有文獻都在收錄範圍之內。《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收錄的內容有:墓地實景、墓葬文物、漢文及少數民族文獻、墓誌墓表等,書末還附有人名、神名、地名、文獻編號索引,極大地方便了讀者對文書內容的查找和比較研究;三是錄文審慎準確。《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在吸取以往文書整理工作的經驗和成果的基礎上,在追求錄文的準確性方面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使文書的文字釋錄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說《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是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的典範之作。

以上是國內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工作及成果,也是本書所依據的主要材料。國外所存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也相繼整理出版,如日本大谷探險隊所得文書已由小田義久整理編纂為《大谷文書集成》三卷(法藏館,1984—2003年);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由陳國燦整理出版了《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日本寧樂美術館藏蒲昌府文書,由陳國燦、劉永增整理出版《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文物出版社,1997年)等等。總之,國內外對於吐魯番文書的出土和整理在不間斷地進行著,吐魯番這個地下寶庫不斷地給我們提供新材料、新問題,“吐魯

番學”也日益成爲一門國際性的顯學。

二、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概況

吐魯番文書自發現公佈以來，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從各個角度抉發文書的價值。綜觀這些研究，多集中在歷史經濟方面，對語言文字的研究則相對較爲薄弱。目前從語言文字的角度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系統研究的當首推王啓濤的“吐魯番三書”——《吐魯番學》、《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和《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考釋》。《吐魯番學》論述了吐魯番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史、法制史、宗教史、邊疆文化史、民族關係史、公文史、語言文字學史等十個方面的關係，是海內外第一部通論性的吐魯番學專著；《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從語料價值出發論述了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敦煌文書、辭書編纂和古文獻整理的意義，並指出了唐長孺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考釋》則從微觀的角度，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疑難語詞進行了考釋。此三書在吐魯番文書語言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除此三書之外，涉及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詞的著作還有蔣禮鴻主編的《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江藍生、曹廣順編著的《唐五代語言詞典》、曾良的《敦煌文獻字義通釋》等。此外，洪藝芳的《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之量詞研究》，對吐魯番文書中量詞的使用情況做了系統的研究。

除上述論著之外，還有一些單篇的考釋性論文，如蔣禮鴻《〈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釋詞》（《敦煌語言文字論集》1988年）；黃幼蓮《〈吐魯番出土文書〉詞釋數例》（《敦煌研究》1985—4）；廖名春《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詞管窺》（《古漢語研究》1990—1）；張涌泉《〈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校釋》（《新疆文物》1990—1），《〈吐魯番出土文書〉字詞雜考》（《吐魯番學研究專輯》，1990年），《〈吐魯番出土文書〉辨誤》（《西域研究》1992—2）；劉瑞明《吐魯番出土“隨葬衣物疏”雜釋》（《西域研究》1998—2），《吐魯番出土文書釋詞》（《西域研究》1999—4）；余欣《吐魯番出土上烽契詞語輯釋》（《文史》2000—4）；張延成《新出吐魯番文書中的若干語言問題探討》（《新疆大學學報》2000—4）；黑維強《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釋》（《敦煌學輯刊》2004—1），《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針氈”考》（《西域研究》2004—4），《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例釋一》（《敦煌學輯刊》2004—2），《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例釋二》（《敦煌學輯刊》2005—2），《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例釋三》（《敦煌學輯刊》2006—4）等等。

綜觀吐魯番文書的語言研究，多集中在語詞考釋和文書語言的價值方

面，對文書中的用字用語特點沒有一個系統的歸納，並且對吐魯番文書這樣的應用文書，沒有從文體角度來考察其語言的特點。本書擬從文體的角度考察吐魯番文書語言文字的特點，輯釋文書各種文體中的格式術語、套語以及俗語詞，以期對文書的進一步整理研究提供參考。

三、本書的研究材料

吐魯番文書“同時材料”的特徵決定了文書的研究最好是從文書原卷入手。本書即以唐長孺主編的圖錄本《吐魯番出土文書》、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書後附有圖版）、陳國燦、劉永增主編的圖錄本《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榮新江等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為主要研究材料。以唐長孺主編的錄文本《吐魯番出土文書》、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為輔助材料，並參考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陳國燦、劉安志主編的《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等書所收集的其他吐魯番文書的情況，以文書原卷圖版為依據，考察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語言文字問題。

第二節 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的價值

一、語料價值

語言研究的價值與語料的價值有很大的關係，因此選取什麼樣的語料作為研究對象是首要的問題。語料的時代、真假、所反映的語言面貌等都是語言研究價值的重要影響因素。蔣紹愚認為語言資料的鑒別首先要確定語言資料的年代，其次要識別語言資料中的後人竄改和訛誤之處^①。吐魯番出土文書作為出土文獻，在語料的價值上無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具有同時性、真實性、通俗性的特點。

（一）同時性

太田辰夫在《中國語歷史文法·跋》中把語言資料分為兩種：一是同時

^①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25 頁。

資料。“指的是某種資料的內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時期產生的。甲骨文、金石、木簡等,還有作者的手稿是這一類。法帖只要不是偽造的,也可看作這一類。不過即使不是這樣嚴格地考慮,粗略地說,比如宋人著作的宋刊本,姑且看作同時資料也可以。”^{[191][頁374]}二是後時資料。“基本上是指外形比內容產生得晚的那些資料。”^{[191][頁375]}吐魯番出土文書自然是屬於同時資料,並且大多具有較為確定的撰寫年代。吐魯番文書出自吐魯番古墓葬群,這些墓葬的年代在晉唐之間,出土文書的大時代背景即在此期間。墓葬中出土的文書大多有紀年,而許多紀年都確切到了月日。即便是沒有紀年的文書,也可依照同墓所出的其他文書來推定其大致年代。除了時代確定,吐魯番文書都是千年前的手寫文書,文書的內容和文字自然也是同時產生的。因此吐魯番出土文書是毫無疑問的“同時資料”。

(二)真實性

吐魯番出土文書雖然都是晉唐時期的寫本,但自其產生後埋藏於地下千年之後才重見天日,在此期間不可能發生改動,也就沒有了傳世文獻由於傳抄、刊刻或其他原因而產生的改動。因此吐魯番文書所反映的就是當時語言的原貌,絕對真實可靠。

(三)通俗性

童丕在《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一書中說:“敦煌寶藏從整體上來說,是來自寺院圖書館,或者說藏經洞。因而所反映的世俗特徵很不明顯。這與吐魯番文書的情況不一樣。”^{[24][頁60]}吐魯番文書的情況是:吐魯番出土文書多來自於民間,世俗文書較多,並且這些文書的書寫者也多是普通的民衆,因此吐魯番文書中充滿了大量的俗字異體、方俗語詞。這些俗字俗語雖然給釋讀帶了一定的困難,但也正是這些俗字俗語反映着當時語言的真實面貌和當時人們使用語言的真實狀態。吐魯番文書的這種通俗性也是其作為語言資料的價值之一。

二、語言研究的價值

(一)有助於吐魯番文書的整理

出土文獻的整理出版既是為了公佈考古發現的新材料,也是為了給研究者提供一個相對可靠的研究文本。因此,對所整理文獻釋錄的準確性就